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4年第1期
（总第19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习近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动态关注

■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要治理“城市病”

■国家艺术基金正式成立

媒体聚焦

■底特律“坠底”之殇

■拷问“人肉搜索”的道德和法律边界

尖峰观点

■彭希哲：剥离式改革——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新方向

■石　勇：从“屌丝”到“土豪”——新话语背后的大众文化反击战

海外视野

■PM2.5浓度14，纽约是怎么做到的？

■韩国：通过立法推动文化发展

研究院之声

■我院陶东风教授参加2013年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

■我院邀请著名作家阎连科发表演讲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习近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12 月 30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

习近平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

习近平强调，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据新华网，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

《意见》提出，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拓展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注重发挥社会实践的养成作用和校园文化的熏陶作用。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新闻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传播正能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发挥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据文化部网站，2013 年 12 月 25 日）

■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要求，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建

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要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也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

（据新华社，2013 年 12 月 14 日）

■ 国务院印发《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对全国 262 个资源型城市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总体部署。

《规划》提出，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我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历史贡献巨大、现实地位突出。然而，当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从根本上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性、机制性矛盾，统筹兼顾，改革创新，加快构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包括开发秩序约束机制、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利益分配共享机制、接续替代产业扶持机制等。根据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明确各类城市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规范成长型城市有序发展，推动成熟型城市跨越发展，支持衰退型城市转型发展，引导再生型城市创新发展。

《规划》要求，要有序开发综合利用资源；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做好规划的贯彻落实，保障规划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完成。

（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3 年 12 月 3 日）

(2)政策解读

■ 易鹏、戴相龙：城镇化未来 3 年需 25 万亿　钱从哪儿来待破解

12 月 12 日至 13 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明确了今后推进城镇化所需要完成的 6 项主要任务。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 3 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 25 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量意味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央提出的城镇化任务中就包含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根据中央安排，今后将会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过去，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以致长期以来各地地方债务问题不断，城市负债率一时间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次会议明确提出来要控制债务风险。债务很多是地方政府借来用于基础设施，因为基础设施几乎全部靠地方政府来做，而地方政府的能力又有限，如此怎能实现可持续呢？只有多元才可持续。所谓多元化，意思就是一些项目由政府掏钱，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而更多的资金来源是要通过社会、尤其是民间资本来筹集。

对于政府而言，城镇化资金的来源无非是税收收入，所以城镇化进程中税种体系的完善就显得格外重要。根据这次城镇化工作会议的安排，今后将会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当前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可以等将来有条件时再发行城市建设债券，所以当前减免税费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在城镇化过程中资金来源问题可以有两点创新之处，一是未来可能发市政债，二是给地方政府培养新的税源。为了减少对土地财政依赖，地方政府很有可能建立地方性的财税体系，比如房产税，就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未来资金的来源。

（据《未来 3 年城镇化需 25 万亿 专家建议多元化融资》，《每日经济新闻》，2013 年 12 月 16 日）

■ 陈炳才：城镇化“不要急于求成”纠正了片面政绩观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由此可见，城镇化不是土地、住房的城镇化，也不是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而应是布局合理、优雅、让人有记忆、有乡恋的城镇化。在当前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急于求成，试图把后来几代人完成的事现在就做完，这种思路应该反省。可喜的是，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纠正了以往的片面政绩观和城镇化思路。

本次会议指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这为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城镇必须让常住人口市民化，不能让新进城的居民低人一等，受到政策和制度和歧视。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不要超越自身能力和条件盲目搞只见楼群不见人的城镇化，更不能搞身份待遇歧视的城镇化。

城镇化以人为本，有着丰富的内涵。不仅要入城农民、常住人口享受市民待遇和福利，从拆迁、建设布局等各方面都要有人性化的安排；城镇必须是生态、环保、节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否则，城镇在严重的污染和雾霾之中，也不是人民所期望的；城镇必须适宜居住、建筑物可长期保存地方特色，而非大拆大建。城镇的建设应有立法、规划，按照规划布局来建设，而非换一任书记市长换一次规划思路。城市群、主城与卫星城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布局，不能是开发商设计的城镇化，不能是为了土地财政的城镇化。一个城镇和城市的发展，不是一任领导和一代人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代人的努

力，不应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的妄想。

（据《陈炳才：城镇化“不要急于求成”纠正了片面政绩观》，人民网，2013 年 12 月 16 日）

■ 杜鹰：《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解读

为统筹推进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出台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也是新一届政府发布的第一个专项规划，体现了国家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国务院颁布这个《规划》，是要解决资源型城市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资源型城市资源开发的秩序不规范，开发强度过大。第二，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资源型产业“一业独大”的问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资源型城市历史遗留问题多，包括民生问题、环境问题。第四，还没有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没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规划》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首次确定了资源型城市在全国的分布。还根据它的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指标，把这 262 个城市区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种类型，首次摸清了全国资源型城市的家底。在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不仅提出了目标，还提出了五大任务。一是合理有序地开发资源。二是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三是切实保障改善民生。四是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五是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设。

资源型城市要率先建立五大长效机制。首先是规范开发秩序，建立资源开发秩序的约束机制。第二，价格形成机制。这是具有根本性的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一个政策。这样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对于合理地确定开采的强度和技术路线，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资源开发的补偿机制，包括生态补偿机制。基本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修复。第四，利益分享机制，其核心是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问题。第五，接替产业的扶持机制。

（据《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向何方?》，《中国环境报》，2013 年 12 月 5 日）

2. 动态关注

■ 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要治理“城市病”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2 日至 23 日召开。全会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把握特大型城市发展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着力推进治理“城市病”的攻坚战向纵深发展。

市委书记郭金龙报告了市委常委会一年来的五件重要工作以及其他主要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部署了 2014 年经济社会发展六项重点任务：一，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坚决抓好大气污染治理，更加自觉地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二，着力以创新驱动支撑发展，更好地发挥中关村示范带动作用，激发文

化创造活力。三，着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大需求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四，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有序推进农村城镇化。五，着力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为契机提升城市服务管理水平，高标准做好峰会服务保障，努力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全力保障交通平稳顺畅，全力维护首都安全稳定。六，着力以实事惠民促进民生持续改善，努力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郭金龙在总结讲话中补充强调，2014 年还要结合总体规划十年评估，考虑总体规划修改，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红线，明确人口总量、城市规模、生态环境的控制目标，坚决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

（据《北京日报》，2013 年 12 月 24 日）

■ 国家艺术基金正式成立

12 月 30 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座谈会，介绍国家艺术基金成立有关情况。国家艺术基金为公益性基金，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拨款，同时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国家艺术基金重点围绕创作生产、宣传推广、征集收藏和人才培养四大方向进行资助，其中艺术创作是基金支持的重点。国家艺术基金在组织管理上设立了理事会、管理中心、专家委员会。与人文领域其他类型的基金相比，艺术基金具有多样性、开放性、广泛性、复杂性的特点。和其他同类政府基金相比，艺术基金打破了体制、系统、行业和地域的局限，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的特点，面向全社会，国有、民营、机构和个人都可以申报。

（据文化部网站，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第二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12 月 19 日，第二届中华艺文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中华艺文奖评选出“终身成就奖”10 名，获奖者是才旦卓玛、朱琳、吴良镛、沈鹏、周小燕、尚长荣、欧阳中石、侯一民、贺敬之、秦怡；“艺文奖”9 名，获奖者是叶小钢、田黎明、朱乐耕、余隆、李雪健、罗中立、赵汝蘅、莫言、裴艳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当天与获奖者座谈时指出，广大文化工作者肩负崇高使命，要将艺术追求融入祖国发展和社会繁荣进程中，用精湛的艺术创造讴歌时代精神、推动时代进步，为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文化部部长、中华艺文奖组委会主任委员蔡武在致辞中表示，中华艺文奖作为由国家级学术机构主办的最高艺术奖，其设立和成功评选，为我国国家荣誉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他提出，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既要坚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靠激发和释放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紧紧依靠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热心支持。

（据文化部网站，2013 年 12 月 20 日）

■ 华表奖与飞天奖揭晓

12 月 26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二十九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一九四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国合伙人》等 10 部影片获得“华表奖”优秀故事影片奖，导演冯小刚、陈力获得“华表奖”优秀导演奖。赵宝刚、张绍林获得“飞天奖”优秀导演。第十五届“华表奖”从 108 个提名奖中，遴选出 56 个各类奖项。第二十九届“飞天奖”则共有 42 部作品获大奖，25 部作品获提名奖。本次典礼还揭晓了包括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优秀导演、优秀编剧在内的 9 个单项大奖及 8 个单项提名奖。

（据《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27 日）

■ 2013 年鲁迅文化奖在京颁奖

由搜狐网与鲁迅文化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2013 年鲁迅文化奖 12 月 4 日晚在清华大学颁出 12 个奖项，涵盖文学、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领域。金宇澄的《繁花》荣获“年度小说奖”，李亚伟的《河西走廊抒情》获得“年度诗歌奖”，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获得“年度图书奖”，章燕紫的《止痛帖》获得“年度艺术奖”，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留学到苏联”获得“年度文化艺术表现奖”，宋冬野以专辑《安和桥北》荣获“年度音乐奖”，话剧《蒋公的面子》获得“年度戏剧奖”，《一代宗师》斩获“年度电影奖”，《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荣获“年度纪录片奖”。

本次文化奖还将“年度彷徨事件”和“年度呐喊事件”两个奖项，分别颁给了“纠结小时代”和“迟来的道歉”。前者因电影《小时代》掀起的论战搅动了 2013 年的文化圈并波及大众，各方围绕物欲与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当下社会的迷茫；后者则因个体敢于为其在十年浩劫中的错误而忏悔受到人们的尊重，使更多的个体勇于反思和忏悔，给社会带来了震撼。“年度致敬人物”颁发给了苏利文，他以独特的眼光在西方重新评价了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有助于西方人重新认识中国美术。

（据《中国文化报》2013 年 12 月 6 日）

■ 珠算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2 月 4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将中国珠算项目列入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入选这一名录的项目达到 30 项。

据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赵海生表示，此次珠算通过审议的过程非常顺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馈的信息，珠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又是实用工具，历经千余年依然发挥作用，并且能够不断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把珠算列入名录，一方面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同时也是对人类非凡创造力的尊重。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巡视员张兵表示，文化部下一步将加强对珠算的保护与传承力度，并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制定中长期保护规划，建立有效的保护工作

机制，同时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以鼓励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他还表示，将适时开展珠算进校园活动，以发挥珠算开发儿童心智的积极作用。

（据文化部网站，2013 年 12 月 6 日）

■ 北京将打造数字出版“航母”

为适应数字出版产业的蓬勃兴起，北京将建设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以加快转型步伐。12 月 17 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与丰台区政府签署战略框架协议，将共同推进这艘数字出版“航母”发展壮大。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孙瑛谈到，近十年来，中国数字出版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数字出版行业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北京的数字出版产业总值现已占到全国的 20％以上，已成为首都经济新的增长点。数字出版基地将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电子图书、数字报刊、数字音乐、数字视频、网游动漫和网络教育等数字出版产业。北京市丰台区宣传部长孙军民介绍，出版基地选址在北京西南四五环之间，周边交通便利。规划显示，基地将采用一区多园的形式建设，总部拟于 2020 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大脑”和“中国新文化硅谷”，为北京乃至全国从事数字出版的企业提供集中发展的场所。

（据中国新闻网，2013 年 12 月 17 日）

■ 2013 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 200 亿大关

截至 12 月 8 日，2013 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 200 亿大关，达 200.32 亿元，同比增长 34.63％，观影人次超 5.73 亿。2002 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召开，电影业进入了产业化改革的新阶段。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法规颁布，激活了整个电影产业，2010 年总票房达到了 101 亿。而将这个数字翻倍，仅用了不到 3 年时间。

总票房能突破 200 亿，原因有四点：影院数量和银幕数量增长；制片能力增强；进口片扩大了引进数量以及媒体对电影消费的推波助澜。相对更重要的是终端的发展，也就是影院的增长、银幕数量的增加。据艺恩咨询的数据，电影营销正在成为制作、发行和放映 3 个传统环节之外的第四个细分服务流程，成为推动电影票房增长的新动力。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 年 12 月 28 日）

■《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3)》正式发布

近日，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发布《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3)》。《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末，全国国有文化企业共计 10852 户(按独立法人统计)，资产总额 18210.3 亿元，所有者权益 9452.6 亿元，全年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9022.2 亿元，利润总额 877.9 亿元。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国有文化企业的资产总额增长了 14.1％，所有者权益增长了 13.3％，营业总收入增长了 13.1％，利润总额增长了 3.3％。

《报告》显示，在各大类国有文化企业中，新闻出版发行服务企业数量占据明显优势。2012 年末新闻出版发行服务企业共计 3475 户，占比 32%；数量位列其后的广播电视电影服务企业共计 1416 户，占比 13%。东部地区国有文化企业资源占用、产出水平保持绝对优势。2012 年末东、中、西部地区国有文化企业户数分别为 6755 户、1868 户、2164 户，资产总额分别为 12148.5 亿元、2262.4 亿元、3450.2 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分别为 5794.6 亿元、1148.6 亿元、1769.4 亿元。

（据财政部网站，2013 年 12 月 27 日）

■《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发布

12 月 17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数字媒体系撰写的《中国动画产业与消费调查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总量不断提高，但单片票房均值不增反降，远落后于进口动画电影。2008 年至 2012 年，国产动画电影单片票房平均值约为 2000 万元，且近年不见增长；而进口动画电影单片票房平均约为 7300 万元，是前者的 3.65 倍。

在电视动画产量方面，我国稳居世界第一。2008 年至 2012 年，我国制作完成电视动画片超过百万分钟，产量持续增长多年后，2012 年首次回调，发展目标转向提高质量与效益。另外，电视动画片生产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双中心格局成型，产量占全国七成，西部、北部弱势地位深化。在消费人群方面，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城市的动画消费者规模庞大。

（据《中国文化报》，2013 年 12 月 25 日）

3. 媒体聚焦

■ 底特律“坠底”之殇

编者按：12 月 3 日，著名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宣告破产，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城市。底特律的“坠底”，给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了极大震动。我们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底特律的覆辙，那些产业结构单一的城市又该何去何从？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有文章提出，数十年前，福特、通用等创造的现代化流水生产线、垂直一体化的高效管理和熟练的蓝领技术工人，一度引领世界工业潮流，创造了底特律“神话”。但随着新兴科技的飞速发展，个性化、多元化、数字化生产渐成时代潮流，节能、环保、绿色等成为消费者的首选。底特律未能及时推进创新，也没有发展可替代产业，最终落后于时代。(据徐飞彪：《底特律“坠底”之殇》，《解放军报》，2013 年 12 月 15 日)很多人都认为，底特律由盛而衰固然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最致命的一点是没有对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转型，违背了城市多样性发展的要求。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

构难以聚集多样化的人口，形成多样化的文化。而人口素质普遍较低的人口结构，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由此推动的服务业也以中低档社会服务为主，制约了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据张鑫：《底特律破产对中国城镇化的启示》，《文汇报》，2013 年 12 月 11 日)

底特律的发展模式，与当下中国工业城市的发展模式如出一辙——资源型单一发展。为什么中国很多城市都准备去走底特律的老路呢？说到底，中国有太多的地方政府参与到经济和产业的决策中，从产业园区到新城开发、再到招商引资，政府之手无处不在，但实践证明，政府往往不比市场更聪明。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营造出优秀企业或产业发展的平台。(据许一力：《城市发展应避免重蹈底特律覆辙》，《经济参考报》，2013 年 12 月 6 日)城市从来不是建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产业和人支撑，即便聘请最一流的设计师，建造最好的大楼和别墅，也不过是一座“鬼城”。(据张锐：《底特律这面镜子》，《上海证券报》，2013 年 12 月 6 日)底特律式破产的另一个启示是，应该建立从源头上约束地方政府过度和无序举债的制约机制。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融资条件了，就因没有建立从源头上约束地方政府过度和无序举债的制约机制，所以还能一再突破限制，通过担保、影子银行、融资平台来获得没有偿债保障的新增债务。(据张小洁：《底特律破产警示举债须有度》，《经济参考报》，2013 年 12 月 5 日)

■ 拷问“人肉搜索”的道德和法律边界

编者按：近日，广东一名女高中生自杀身亡。此前，一家服装店店主因怀疑该女生盗窃服装而将其视频截图发到网上求“人肉”，使其个人信息被曝光，并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这一自杀事件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人肉搜索”的争论，人肉搜索的合理性及其使用不当可能带来的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一些论者认为，人肉搜索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认为是违法或侵权行为。“人肉搜索”引擎不过是近来在互联网兴起的一种资料搜索方式，旨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答的人性化搜索体验，未必具有侵犯个人隐私的原罪。(据张玉胜：《网络寻贼是一场网络暴力》，《人民法院报》，2013 年 12 月 17 日)多数成功鼓动起人肉搜索的网帖，其个人信息被曝光的对象，大都是存在着违法嫌疑和道德问题的。响应者更多站在道德角度，将人肉搜索当成保护弱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惩恶扬善的正义之举。(据姜泓冰：《以正义为名“人肉”会走多远》，《京华时报》，2013 年 12 月 15 日)“人肉搜索”之所以风行，在于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且能让公众行使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北京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志存强调，“如在舆论监督中披露的信息并不能据以锁定某个人，就不构成对个人信息的侵害，”而且，“对于公职人员，对其道德素养有更高要求，需要接受更多的舆论监督。”(据王地、王岚：《“人肉搜索”的法

律边界在哪》,《检察日报》,2013 年 12 月 21 日)

也有一些论者认为,所谓“人肉搜索”,看似主持正义,实则窥探隐私,说穿了就是人类好奇心的阴暗面,是对虚拟世界权力的贪欲。网络不是逃脱罪责的借口,任何人都不该做躲在屏幕背后的网络暴民,任何网站也不应该成为网络暴力的平台。(据罗俊:《应给“人肉搜索”立规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立新表示,“人肉搜索”使用不当,可能会侵犯被搜索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等相关权益;符合一定条件的,还需承担相关刑事责任,可能面临侮辱、诽谤等罪名的起诉。他建议,应该采取法律措施来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据范传贵:《遏制“人肉搜索”暴力需进一步保护隐私权》,《法制日报》,2013 年 12 月 20 日)总之,网络监督是有底线的,不能为所欲为,应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侵犯他人隐私,不能动辄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进而鼓动、形成一股网络暴力,伤人名誉、尊严和性命,甚至带来更大范围的不稳定因素和更严重的后果。(据林琳:《网络曝光不能只有“暴力”没有底线》,《工人日报》,2013 年 12 月 17 日)

■ 十面“霾”伏中的思考

编者按:2013 年 12 月,一场罕见的大范围雾霾笼罩了我国,陆续有 20 多个省份、100 多座大中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雾霾天气,波及范围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等南方沿海地区。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 52 年来之最。

关于雾霾的成因,相关专家给出了不同层面的解释。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认为:一是不利气象条件造成污染物持续累积;二是机动车尾气和北方冬季燃煤采暖对空气质量恶化影响较大。(据《三问今冬十面“霾”伏》,《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12 月 7 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认为,如果我们征税的环节更多向消费端移动,地方政府在吸引投资时就不会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给缴税就行。如果能从根子上把税收制度理顺了,地方政府不再拥有无限的事权,把方向定位好,给予一定的财税保障,或许可以从根源上减少污染。(据《专家:治污别光盯着邻居,做好各自的事更重要》,《中国经济周刊》,2013 年 12 月 10 日)

很多媒体都提出,治理雾霾需要持续的、制度化的“高度重视”,而不是运动化和大跃进,不是比谁做得更极端、更彻底,更能在短时间中拿出“实绩”和吸引眼球。(据曹林:《治理雾霾是持久战而不是运动战》,《新华每日电讯》,2013 年 12 月 20 日)针对北京市近期推出的人工消除雾霾试验,有媒体认为,人工消霾成本高昂,且治标不治本,应当慎重实行,从长计议。(据于明山:《“人工洗天”花钱多收效小》,《新民晚报》,2013 年 12 月 19 日)钟南山教授认为,从中央到地方要下决心,联防联控,十年或有明显改善。政府可选择部分污染严重的大城市,将治霾成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企业也应有所作为,把减少污染放在追求产值之前。公众应当培养环保意识,积极改变生活

方式和出行方式。(据《钟南山：雾霾猛于非典 治霾应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新华网，2013 年 12 月 17 日)还有专家建议，未来应该多使用经济手段，如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增收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等；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发挥消费税在环保方面的调节作用。(据刘斌：《“清洁空气法”或年内出台》，《华商报》，2013 年 11 月 6 日)

■ 郭德纲再引风波：封杀与反封杀

编者按：近日，郭德纲在微博上发了一首打油诗，语含对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去世的讽刺，引起舆论非议。随后，北京电视台呼吁全国近四百家电视台“联合抵制”郭德纲。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巨大争议，各方围绕道德、娱乐市场以及公权力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由于中国文化中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郭德纲“幸灾乐祸”的举止本能地触碰了舆论敏感的道德神经，但随着“公权力”的强势介入，似乎在一瞬间，郭德纲从一个“道德堪忧”的反面典型变成了民众同情的弱者。在互联网时代，此事快速溢出个人恩怨的范围，仅凭道德依据“封杀”一名艺人的难度，以及谁有资格掌管“封杀”大权，成为了更值得探讨的话题。(据李北辰：《封杀郭德纲的是与非》，《华夏时报》，2013 年 12 月 25 日)对此，网友分为旗帜鲜明的两派。支持的一方认为“私德”绝不仅仅是私事，很多时候照样关乎公共利益，有关方面呼吁“联合抵制”，合情合理。反对的一方则坚持认为，电视台是一种公共资源，不应该用于小范围的恩怨。由官方发起的针对个人的封杀行为，不管以何种理由出现，都缺乏明确且充满说服力的标准。(据《封杀与反封杀，到底谁说了算?》，《检察日报》，2013 年 12 月 20 日)

北京电视台的这次远谈不上成功的“抵制”行动，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义。大众对于公共机构的期待，正在变得愈发具体、愈发现实。电视台作为社会教育的机构固然还有着牢固的合法性，但新的文化氛围和技术环境已经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自主权，机构、大众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写。(据常江：《砸纲恩怨》，新华每日电讯，2013 年 12 月 20 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电视台会作出何种选择，似乎是一个不需深究的问题。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部分电视台的负责人事实上已经做出了表态。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职业共同体的概念，行业协会对于成员单位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市场的压力之下，部分电视媒体工作者早已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对于自己同行所遭遇的不公正并没有从道德的方面进行检验，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依然会以契约自由为幌子，无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发出的呼吁。(据乔新生：《联合抵制的权利边界》，《检察日报》，2013 年 12 月 20 日)

4. 尖峰观点

■ 彭希哲：剥离式改革——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新方向

户籍制度经常被批评为中国社会不公的根源，它造成了城乡分割和城市中的新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利益的不公平。这些社会不公，在本质上是我们长期忽视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结果，是我国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等制度安排上出了问题，不能简单地都归因于户籍制度的过错。

近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试图破解二元结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大都是按照两种路径来进行的。一种路径是打破同一地域农业、非农业户口管理的二元结构，将城乡居民统一为市民，并给予基本相当的权益和福利。第二种改革思路基本上是准入机制，即通过居住证等方法向外来人口中的部分群体提供有限的福利。但是，这些改革还是一种捆绑式的改革，改革的逻辑都是先取得户籍，再享受权益。它并没有真正解决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即剥离依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和权利。

积分权益制就是城市政府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根据当地人才需求和城市承载力，综合考虑所有外来人口在城市的连续工作年限、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就业行业和岗位、投资规模、纳税额度、获奖等级、计划生育、遵纪守法等情况进行积分登记。积分指标体系由基础指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等组成，积分累积到一定分值后，即能够享受该城市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福利。

积分权益制并非是一种准入性、捆绑式的户籍改革，而是一种剥离式改革，其核心思想依据“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通过积分获得相应权益，并不强调通过积分获得户籍，把依附于户籍上的权益剥离开来。当然，获得户籍也是权益的一种类型。这一办法可以利用和完善已经存在的外来(实有)人口登记系统，并使得外来人口从被动登记转化为主动登记，因此运作的行政成本相对较低。积分分值的设定，可以对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就业领域发挥引导作用，也为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转移人口的文化技能素质提高提供了外在动力。同时可以使政府在公共福利和服务提供方面，有一个可以利用的载体，有利于实现外来人口市民化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协调平衡。

（据彭希哲：《剥离式改革：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新方向》，《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11 期）

■ 李国平：质量优先，规模适度——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中国城镇化表现出诸多的独特性，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城镇化发展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过快、过猛或者说“冒进式”的城镇化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核心。因此，新型城镇化一定是质量优先的城镇化，一定是规模适度的城镇化。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存在重速度轻质量等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

城镇化速度过快，“准城镇化人口”大量存在，出现了“虚高的城镇化”。二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三是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进程滞后，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又叠加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四是城镇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依然严峻。五是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大城市病”显现且已相当严重。六是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财政、政绩考核体系的设计等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遏制冒进式城镇化和空间失控，应采取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走一条“高密度、高效率、节约型、现代化”的道路。第一，走质量优先的城镇化发展之路。一方面应以城镇产业优化升级、资源与能源保障、城镇基础设施特别是社会文化设施建设、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为中心，全力促进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努力改变传统粗放型的城镇发展模式，建立起低耗、低碳、高效、集约、宜居的新型城镇发展模式，促进城镇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第二，城镇化速度和规模要适度。第三，未来十年应该是“挤水分”的内涵型城镇化。通过十年时间消化解决上亿“准城镇人口”，促使已被统计到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推进包括土地、投资、就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显著提升城市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市内社会阶层差异。第四，通过严格控制土地供应，规范控制城镇空间开发秩序，设定城镇增长边界，强化“交通导向发展”，通过加快城市内部各类土地的再利用等方式实现城镇的精明增长，从而遏制城镇空间扩张。第五，大力发展网络化大城市，着力解决“大城市病”。

（据李国平：《质量优先，规模适度：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11 期）

■ 阎江：城市空间中历史文脉传承与信仰重建

今天，面对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犬牙交错的社会现实，我们如何在再城市化过程中，借助城市历史传承、公共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等措施重塑城市的精神与信仰，是一个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的城市发展变迁中，城市的物理形态成为人们崇拜和竞相模仿的对象。政府的城市改造从市场化获得资源，更获得动力，民生目标和社会价值受到冲击，考虑经济发展和照顾资本利益更重于考虑居民利益或文化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普遍的城市空间肌理和社会脉络的破坏，历史街区和地方文脉的消失等。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还远未完成的时候，面临着城市形象的竞争；在城市文脉尚需培育的时候，遭遇着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不断用地动迁的压力；在历史文化与环保等意识诉求开始萌芽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未充分成熟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和民主能力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准，大多数人包括地方政府部门还在沉迷于高速发展的怪圈中，不能自拔。

当下庞大的流动人口对城市民俗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城市文化之根或文脉许多时候其实指的就是民俗，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也到达了新的高

度，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简化为经济或消费关系。对于城市原住民而言，传统社区关系和认同空间处在不断瓦解中。对于城市新移民而言，居住时空的距离已经使得自身的民俗信仰趋于弱化、分散，而其主要聚居地更面临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人参与和传承的困境。

当前的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城市生活体现每个公民的公平和幸福，为城市生活的终极目标提供信仰。但我们或许更应该从不同城市、不同族群的民俗文化中寻求，因为它曾经长久地为各个族群提供稳定牢靠的信仰和观念，它们也有理由在当下的世界中发挥其自身的智慧和历史积淀意义。我们今天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应当重复过去的文化乌托邦理念，即用一个模式、一种理想来改造和塑造整个社会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当是多层次、多形态，能够满足各个文化群体文化个性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信仰共同体。

（据阎江：《城市空间中历史文脉传承与信仰重建》，《探索与争鸣》，2013 年第 11 期）

■ 樊杰：让城市群不再是一群城市

城市群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但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较为成熟外，我国其他城市群更多体现在概念上，发展尚不理想，所谓的城市群更像是一群城市。

目前的城市群往往具备一个有影响力的核心城市，但在能不能形成有效的产业分工和协作，把各种生产要素在区域的城市之间进行合理组织，实现整体竞争力的最大化方面，我们通常做得不好。有三方面原因造成了城市间经济联系的薄弱：一是区域定位分工不明确；二是核心城市与周围城市在硬件条件上存在巨大鸿沟；三是软环境上行政区之间的人为障碍。

在改革开放初期，区域之间的竞争对发挥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支撑经济发展总量增速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是带来重复建设问题，体现为区域产业发展同质化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浪费。二是公共资源的破坏，各行政区域将主要精力放在做大自身 GDP 上，很少有城市愿意主动承担进行生态建设、维护大区域内生态和资源平衡的责任。

我国中、东、西部城市群在发展路径上没有真正摆脱一些基本特征和弊端。它们各显神通的增长模式，在形态上看似乎是一个集中的城市群，但从内部观察，区域内中心城市还在极化的过程中，辐射扩散和组织影响的作用还没发展成熟。如果只谈经济增长的话，显然中西部地区极化中心城市依然是一个核心战略，但在强化中心城市影响力的过程中，不能将经济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目标的唯一取向。更重要的依据是，当城市发展到当前规模后，是否能为老百姓提供最舒服、最幸福的生活。

（据樊杰：《让城市群不再是一群城市》，凤凰网·城市中国说，2013 年第 7、8 期）

■ 李永刚：互联网博弈的中国议题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官民博弈早已越过意识形态的内容疆界，在更广大的日常生活领域铺展开来。对公共事件、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的网络围观，成为中国网民一种醒目的生活方式。造成官僚制被动的核心原因，大致可以表述为：传统的以确定性为设计原则的政府职能系统，已经难以应对新的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网络事态。因事件或话题而随时汇聚的“议题族群”，如果议题的粘性够强，就能串联起那些没有直接利益卷入的民众，打通各阶层的关注，激活能量人物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资源来对政府施压。但其内部组成、意见观点、群体属性却未必铁板一块。同时，民间也没有取得完胜，在日常事件的反复博弈中，官民有进有退，胜负难分。

要理解互联网上的中国故事，还得站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来审视。全球数字空间的技术革命正好与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强势叠加，产生了“双峰合流”的惊人效果。在诸多领域，一元治理结构的惯性和多元生长的趋势相互较劲，造成了“一只脚在未来，一只脚在过去”的撕裂结构。双峰合流的激荡之下，代际冲突的频度加深，不同人生际遇的人群，在核心价值观和可选参照系上落差显著。代际冲突的裂痕，又被技术因素继续放大，通过对互联网的熟练使用和依赖程度来划分，互联网上的阶层重组如火如荼，又和现实的阶层固化强烈对冲。解铃还须系铃人，化解时代症候群的药方也许早已发明。无数网民的认知盈余、自由时间和参与热情相互缠绕，互联网可能无意中创造了一个相互耦合的社会建设与激励机制。时间、知识和热情的循环互补、真诚交往，有可能缝合代际冲突和阶层重组带来的各种伤痕，有可能修复本来就没有决绝冲突的官民关系，有可能将自私的原子个体聚合为新型社会的共同体。

（据李永刚：《互联网博弈的中国议题》，《文化纵横》，2013 年 12 月）

■ 石勇：从“屌丝”到“土豪”——新话语背后的大众文化反击战

这几年，中国新富阶层的炫耀性消费，甚至“仇穷”的各种言论和行为一直在刺激有被剥夺感的大众。“仇富”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仇穷”在先。但大众的“仇富”骨子里带着艳羡。他们比谁都想成为他们所“仇”的阶层。这是金钱所支撑的社会价值排序的强大威力，他们接受的只是有利于新富阶层的那一套文化意识形态，结果是注定的，他们只能在游戏中被新富阶层全面压倒。相应的是，在被刺激、羞辱中，大众所产生的愤怒，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这种愤怒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在疗伤。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 2012 年“屌丝”词语的出炉和大规模传播。大众开始寻找更能在心理上保护自己的方式。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自嘲。大众文化自觉利用了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我都对自己下手了，你对我的伤害也就没那么大了，同时，我还获取了道德优势。这是心理博弈的一个逆转。虽然大众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支撑，但他们在站稳后，借助于群体力量，已经可以出击了。

如果说在 2012 年大众还只是用“屌丝”这一自嘲来防守，让自己在心理上站稳的话，那么 2013 年他们发明了“土豪”这一新式武器，虽然玩的仍然是戏谑的游击战，但已开

始在文化上进攻。对这一命名，新富阶层毫无文化上的反击能力，只能被动挨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也没有文化自信。不错，金钱、成功之类的文化意识形态有利于他们，那正是今天中国世俗观念的主流，但这些东西非常俗，不具备在文化上包装阶层地位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屌丝化”和“土豪化”一体两面。而一个“土豪化”的中国社会，表征的正是新富阶层及其模仿者们在自我认同，以及他者认同上的深深焦虑。

从含义上看，“土豪”的命名掺杂有艳羡、价值上的贬斥、嘲弄等复杂的情结。它仅仅是一种高级版本的“弱者的武器”，即话语上的解构，没有“污名化”的色彩。这决定了“土豪”的大众话语狂欢，在解构上远不能和解放前的革命语境相比。革命群众是要把土豪们，及背后的等级制度连根拔起，而今天的大众却存在刘邦、项羽看秦始皇出游时的那种心态。而这也意味着，大众给“土豪”们留下了成为“贵族”的机会。所以，虽然大众已经反击，但 2014 年“土豪”的话语泡沫注定破裂。

（据石勇：《从“屌丝”到“土豪”——新话语背后的大众文化反击战》，《南风窗》，2013 年第 26 期）

5. 海外视野

■ PM2.5 浓度 14，纽约是怎么做到的?

纽约的 PM2.5 浓度，在 1999－2000 年间是 20 出头，日后持续下跌，到 2010－2012 年间下降到了 14 上下，而这期间纽约人口增长了三十多万。这样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

首先，纽约市政当局制定并实施了“清洁取暖计划”，鼓励用户采用洁净的取暖能源。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把烧重油的取暖设施改为烧天然气。另外，城市计划到 2015 年取代所有的烧 6 号燃油的取暖设施，到 2030 年取代所有烧 4 号燃油的取暖设施。2009 年以来，纽约在人口增加了十几到二十万的情况下，6 号燃油的消费量下跌了 29％。另外，纽约的公交系统，拥有全美最大的使用混合动力柴油机和压缩天然气引擎的车队，其 28％的出租车在 2010 年时已经使用了混合动力或其他清洁能源。纽约使用公交系统的人口比例为全美第一，布隆伯格政府大力推进公交和自行车通勤，只有 48％的纽约家庭拥有汽车。

纽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对工业和民用能源的改造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无疑需要政府承担责任。但是，低机动车使用率、高公交使用率，也被公认是纽约成为美国最有能源效率的城市的核心要素。这就不仅要依赖政府的公共政策，还有市民的配合，其中包括对政府某些限制车辆的公共政策的支持。

（据薛涌新浪博客，2013 年 12 月 16 日）

■ 韩国：通过立法推动文化发展

2013 年，韩国总统朴槿惠宣布“文化隆盛”为其政府三大执政纲领之一。各界普遍认为，2014 年是开启“文化隆盛”时代的重要年份，韩国在这一年中的文化政策变动备

受关注。

2013 年 12 月 10 日正式通过并于 2014 年 3 月开始施行的《文化基本法》是韩国文化领域一项极为重要的法案。该法案首次对保护国民文化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为形成“以需求者为中心的文化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基础。此外，法案还引入文化影响评价制度——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在制定主要政策或计划时，要从文化角度，针对相关政策或计划对国民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

从 2014 年 1 月开始，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三被指定为韩国“文化日”。韩国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政策鼓励市民参与文化活动，强调文化的全民共享性。2014 年 2 月起，政府将针对领取基本生活保障金的人员及低收入阶层发放“文化乐享卡”。自 2014 年 3 月开始试行“文化通行证”政策和“艺术人通行证”政策，以为文化艺术从业者提供更加健康、公正的环境。2014 年 3 月开始施行的《博物馆及美术馆振兴法》修正案将为社会捐资捐物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2014 年 6 月，韩国《著作权法》修正案也将正式发挥法律效力。

（据中国文化传媒网，2013 年 12 月 31 日）

6. 研究院之声

■ 我院陶东风教授参加 2013 年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

12 月 20 日，“2013 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文化艺术)”邀请国内著名文化学者、互联网业界权威人士和优秀原创作者，围绕新媒体背景下互联网文化艺术新特点，网络文化中技术应用、媒体渠道、投资运营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互联网文化建设者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受邀出席并发表题为《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的长篇演讲。

陶东风教授认为，当今时代，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正在经历深刻转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微时代”。微时代、微文化的到来昭示着人类文明发展路径的重要转向，富含许多积极因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创造了全新的生长空间。与此同时，尚不成熟的微时代和微文化也给人际关系、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亟需直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创新思维，提高决策的效率和科学性。我们应该树立掌握主动权的意识，积极迎接微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各项挑战，从而建构适合微时代微文化语境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

■ 我院邀请著名作家阎连科发表演讲

12 月 25 日，受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邀请，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阎连科来我校做了题为“笔下的蓝天”的演讲，本次活动由

陶东风教授主持。

阎连科指出，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与现实生活脱节，很多一流作家的最好作品都与最近30年的历史没有关系，而不关注现实的作家是有问题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中国现实的复杂性、荒诞性、丰富性、深刻性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国家的审查、执行者的审查以及作家本人的自我审查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手脚。于是，很多人都自觉选择了一种远离现实的“安全＋艺术”的写作模式。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很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头关注现实，不管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如何，这种转向都是值得肯定的。他还认为，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写作资源异常丰富；对世界文学非常熟悉；年富力强的作家呈现群体性特点。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演讲结束后，文学院张志忠教授做了精彩点评，到场师生也与作家本人进行了交流。

（本期摘编人：丁玥澍、王丽媛）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陈国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